

西方学者 论 毛泽东

洪峻峰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西方学者论毛泽东

洪峻峰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新登字 09 号

西方学者论毛泽东

洪峻峰 编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8.875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615—0777—1/D·50

定价:5.80 元

责任编辑:张加才

陈森镇

封面设计:张文化

目 录

西方毛泽东研究述评	洪峻峰(1)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26)
毛泽东的思想来源	[美]本杰敏·许瓦茨(44)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美]费正清(57)
1949——1965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	[美]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70)
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探索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84)
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文化透视	[美]杜维明(111)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	[美]B·沃马克(136)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	
.....	[美]莫里斯·迈斯纳(148)
毛泽东的斗争论	
.....	[美]J·斯塔尔(161)
毛泽东的认识概念及其知识环境	
.....	[美]弗里德里克·韦克曼(188)
毛泽东的实践论及其理论渊源	
.....	[法]米歇尔·卢瓦(213)
毛泽东的个性特征	
.....	[英]迪克·威尔逊(227)
毛泽东研究:分析及评价	
.....	[澳]尼克·赖特(248)
后 记	(279)

西方毛泽东研究述评

洪 峻 峰

毛泽东是一位世界性的历史巨人。早在 30 年代,一些进步的西方记者到延安考察时,就写出了一批介绍毛泽东的报导和描述毛泽东的传记。新中国的诞生举世瞩目,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因而也成为各国“中国学”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日益加深,出版了大量论著,从各自的立场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观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在近几年的“毛泽东热”中,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大量传入,并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对西方毛泽东研究进行一番分析评述,有其重要的意义。

西方研究毛泽东的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说过,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主要和最深远的贡献,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对毛泽东的思想渊源的探索 and 思想性质的判定,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的着重点。可以概括地说,“溯源”与“定性”,是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两大主题。而这两者又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即通过寻踪溯源而昭示其思想属性。西方学者关于这两大主题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三个论题:一、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二、毛泽东的思

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三、毛泽东的思想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

一、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已作出的正确的论断。然而在西方毛泽东研究中，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却是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两次大规模的论战，形成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三大派别。

早在1951年，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学者本杰敏·许瓦茨在他的《中国共产党主义与毛的崛起》一书中，就提出了“毛主义”这一概念，用以表述毛泽东富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表述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1960年西方研究中国的权威性刊物《中国季刊》创刊，美国学者K·A·威特夫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主义”的传说》一文，指责许瓦茨提出“毛主义”的论题是在陈述一个传说，认为“毛主义”是不存在的。许瓦茨则写了《“毛主义”传说的传说》对威特夫的指责进行反驳，进一步阐述了以他和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的看法。

威特夫和许瓦茨的争论，代表了当时西方中国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种对立观点。威特夫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理论都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毛泽东的政策路线是共产国际方针政策的贯彻，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也是苏联模式的搬用，毛泽东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贡献，因此，不存在

什么“毛主义”。许瓦茨则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有其独特的背景，毛泽东的思想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下和革命的实践中形成的，它虽然也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同马克思主义的原型已有很大差异，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毛主义”即标识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创造。

这一场争论是有政治背景的。当时的美国政府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一场由苏联操纵的国际阴谋，舆论界流行的是“阴谋论”、“莫斯科中心论”。威特夫保守派学者，在政治上持反共立场，还是美国所谓“百万人反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他提出的上述观点，旨在说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是外来的，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他的这一观点是“阴谋论”在毛泽东研究中的表现。许瓦茨的观点则体现了美国学界批评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一种主张。早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初，美国的一些外交家、观察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就提出，二战后美国之所以在中国失败，是因为美国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共，采取了错误的对华政策。在“麦卡锡主义”时期，许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中国地域研究规划”主任费正清，都受到了审查和迫害。1958年费正清在他的《美国和中国》一书的增订版中，批评了麦卡锡主义对中国问题的错误看法，表达了试图客观地观察新中国，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从而制定相应政策的态度。1959年费正清就任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主席，在亚洲研究协会的第11次年会上发表演说，再次批评美国过去的现代中国研究，呼吁不受政治限制不带政治偏见的自由的客观的研究。许瓦茨是费正清主持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背景，强调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独创性，与费正清等人关于对华政策的见解相呼应。许瓦茨的观点代表了哈佛学派的共同意见。

许瓦茨提出的“毛主义异端论”和他对威特夫观点的批驳，对

于西方毛泽东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它抨击了当时这一研究领域流行的“莫斯科中心论”和共产国际阴谋论的观点,反对在研究中带政治偏见,提倡公正、客观的研究态度,扩大了毛泽东研究中自由派观点的影响。就理论本身而言,许瓦茨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的论述,也有许多可取之处。然而,“异端论”毕竟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它在总体上是偏颇的,因而引起其他学者的批驳也是无可避免的。

1976年10月,英国出版的国际性杂志《近代中国》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以“马克思与毛泽东”为论题,旨在重新研究二者思想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新左派学者首先对自由派学者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批驳,并引起了自由派代表人物的反击,从而形成了一场历时一年,有十几位学者参加的论战。

美国中国学中的新左派,主要是一些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与自由派学者一样,也反对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对华政策,而且态度更激进。他们面对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而瞩目于新中国,认为新中国是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希望所在。他们对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和理论观点,例如平均主义、反官僚主义、文化革命等等,持有好感,自觉地维护毛泽东的思想权威。在这场论战中,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R·M·佩弗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毛与马克思——对“中国研究领域”的批判及对这个问题的初步重新评价》,美国密执安大学的A·G·沃尔德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与社会变化:重新研究毛的战略及思想中的“唯意志论”》,首先对自由派所谓的“唯意志论”进行了批驳。而自由派的主将许瓦茨、施拉姆和莫里斯·迈斯纳等人则起而应战,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异端”说。

自由派学者的“异端”说的根据是什么呢?首先,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经济

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肯定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而毛泽东则强调自觉的人的活动对历史进筑的决定作用，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在未经历过资本主义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次，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在于肯定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引导其实现自己的使命，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毛泽东则创造以农村为基础的农民游击战争，以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中共以农民为主体。据此，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已有很大不同，它有很大的独创性，同时也融进了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等其他思想因素。许瓦茨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与具体实际的出入，必然出现理论自身的分离，列宁主义是这一分离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而“毛主义”则标志着另一阶段。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中具有某种“天然的列宁主义”的因素，这使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一开始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接受了列宁主义的思想。后来，中国的环境和他的革命经验以及他思想中的唯意志论的影响，又使他克服了“天然的列宁主义”，完成了理论的独创。他们认为，指出毛泽东背离马列主义，并非贬低毛泽东，而是肯定毛泽东的理论的独创性。

新左派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解说和对中国革命实际的具体分析，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新左派也肯定毛泽东思想理论的独创性，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同于保守派而自由派相同。但毛泽东的独创性意味着什么？自由派认为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则认为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又显示出二者的区别。

必须指出的是，近十几年来，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观点有了新的变化。新左派对自己以前的一些左的观点和论断进行了反思，同时也接受了自由派学者的某些观点，肯定毛泽东的思想理论除了渊

源于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施拉姆、迈斯纳等人也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肯定了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思想的一致性,承认毛泽东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因素的二元化,即既源于马克思又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既包含马克思主义因素又有中国成份。施拉姆说,即使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不表明他的思想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他的错误思想也有相当多的西方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至于成熟期那些正确的思想,“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其思想还是构成了一种源于西方的颇为革命的思想体系,也构成了一种西方文化的传播思想感情的媒介。”^①说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源于西方而不是源于中国,这与自由派原先的观点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自由派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因此改变。首先,他们认为,这种源于西方而构成的革命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变体”。施拉姆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究竟是否“马克思主义的变体,因而最终成为西方文明的传播媒介”?他最终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回答。这种“变体”论与“异端”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次,他们所谓的西方来源,并非专指马克思主义,而是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以前他们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方面探究“异端”的思想根源,现在则转而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方面寻找“变体”的理论来源。自由派学者中以迈斯纳为代表的一些人,即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自由派的观点尽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并没有失去自己的特色,它与新左派的根本区别也没有消失。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

二、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 文化传统的关系

过去，我们国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多着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从革命实践的过程入手探讨，而没有将它提到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广阔背景中进行考察，分析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继承，探讨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和作用。这一研究状况直到近十几年来才有改变。而西方研究毛泽东的自由派学者，较早就已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渊源。

如前所述，自由派学者把“毛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否定它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那么，“毛主义”的理论来源于何处？他们认为，一部分是来自列宁（后又超越了列宁），更主要的是来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他们的研究视角和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把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形成置于中西文化冲撞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费正清曾提出“冲击——回应”的观点，以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回应作为分析模式。这一模式也成了自由派学者研究毛泽东的思维框架。施拉姆在他关于毛泽东的传记的名著《毛泽东》中，是这样引出毛泽东的：“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革命之后而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既由理论家又是活动家的毛泽东决定的。如果说新中国看来趋向于在一定程度上将共产主义因素和传统因素融为一体，那么，这种走向融合的倾向是中西两种模式和思想长期在极其混乱的状态下相互斗争的结果。到19世纪末，显而易见，中国必须向欧洲人学习，以增强国力，抵抗其入侵。……中国人因忧虑国家的前途，也因

捉摸不定究竟能够或应当从历史上批判地继承些什么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出世了。”^① 在这里，作者直接了当地把两条线索联系起来：一是毛泽东从出生到事业的成功，另一是中西文化从冲撞到走向融合。

二，重视毛泽东早期思想对以后思想演变的作用。在西方毛泽东研究中，有整体性与阶段性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之别。整体性的分析方法强调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的完整性，着重分析其基本特征，这就必然要相对忽视其思想成熟之前的早期特征。自由派学者则重视对毛泽东的思想作阶段性研究，强调早期思想对以后思想演变的作用，追溯“毛主义”的中国文化根源。毛泽东早年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熏陶，后来虽然实现了思想转变，但传统观念已扎根在他的意识深处，积淀了他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贯穿于他的思想的各个发展阶段的一条伏线。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指出：“1919年，当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徒时，那些后来决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他对革命的看法的基本思想倾向就已经存在。”^② 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划分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阶段，以1917—1927年作为第一阶段，而不以1920年的思想转变作为不同阶段的分界线，即是强调了思想转变前后的这种内在联系。

三，把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看作是“毛主义”的重要起源之一。如前所述，自由派学者的“异端”说，把“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看作是“毛主义”的重要特征。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又从探源的角度，把“毛泽东主义的起源”归诸唯意志

① 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第3—4页。

②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6页。

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三种因素。民族主义与文化传统关系密切自不待言。在他们看来，毛泽东的唯意志论也主要是受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所谓的唯意志论，是指强调历史进程中的人的因素，强调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的思想和意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传统儒学也强调人的道德力量，强调通过改变人的思想意识而达到改变现实，认为修身养性可以达于治国平天下。自由派学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唯意志论特征，恰恰体现了中国儒家的传统。

四，强调毛泽东在建立“毛主义”的过程中对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传统语言和传统表达方式的利用，肯定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作用。要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套中文词汇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术语。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词汇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而这套词汇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的历史典籍和民俗文化。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讲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首先就谈了马克思主义新概念的汉译问题。许瓦茨也强调了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语言革新的意义。他在《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中写道：“戈德曼指出，毛泽东本人延安时期在这一领域的努力，并不下于一种发起一场新的语言革命或完成‘白话’革命原初目标的努力，它是一种对现在主导中国交流媒介的语言具有巨大影响的努力。马列主义原先难以改变的外国和理性化的语言，已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毛泽东思想的语言，但它并没有被抛弃。显而易见，这种语言仍大量与来自传统的文学和古语交织在一起，它似乎断言——即便在文化革命以后的现在——过去统治阶级的语言较

之西方语言更贴近中国大众。”^① 他们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提倡“新鲜活泼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原理,即如果要使马克思主义为一个与欧洲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的人们所理解、所接受,就必须用该国人民易于理解的,按照他们的心智和传统是有意义的生动语言来表达。也就是说,表达的语言和方式的民族化问题,首先是从“接受”的角度考虑的。但这必然导致二重后果。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通过这套传统语言和表达方式而继续保持对毛泽东的影响,使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传统语言和词汇原先已有特定的文化意蕴,用它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然带上原有的传统色彩。弗里德里克·韦克曼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就指出:“毛所理解的那种语言,既包含了中国以前固有的观念,又吸收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名词。”“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民族化的形式,从而使得它能通过承认许多其它‘语言’并不接受的分析方式,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在一起。”^② 在他看来,语言表达的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而只有把握民族化语言意蕴的二重性,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融合中西思想的方式,才能理解“毛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施拉姆在分析毛泽东后期的错误时曾经指出,毛泽东曾用“大同”一词来表述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用“独裁”表达专政,用“大权独揽”表达集中。但“独裁”的传统意思是专制,“独揽”的传统意思是专断,“大同”在中国传统中表述的则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一种无争的乌托邦境界。毛泽东用这些中国原有的词汇来表

① 见《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② 韦克曼:《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达,既反应了他的某些思想偏向,又造成了表达语言的二重意蕴,使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渗进了别的意思,从而偏离了“正统”。

毛泽东晚年思想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是西方学者讨论更为热烈的一个话题。

自由派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晚年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更深。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的思想在六十年代愈来愈广泛地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这可以说是自由派学者的共识。

那么,毛泽东晚期思想中的传统影响从何而来?综观他们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两个论点。

其一,“早期复活”论。西方学者探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错误,往往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演变的内在逻辑寻求解释,把晚期思想与早期思想联系起来。韦克曼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称,他的著述是震惊于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因而试图透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知识环境,以揭示“继续革命的理论根基”。通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考察的知识环境,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早期所接触的各种思潮,包括诸多的中国传统思想。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毛泽东早期受到中国正统文化的正规教育,也深受中国民间文化的影响。1920年思想转变之时,传统的影响没有根除,而是成为一种无意识潜伏下来。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浓厚的传统色彩,就是早期思想中传统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

其二,“二元分离”论。如前所述,西方毛泽东研究界经过60年代初和70年代中两次论战之后,各派观点都有了一些变化。新左派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传统因素;而自由派也承认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来源和因素,基本上持“双源”论、“二元”论。有些自由派学者便以“二元”之间的关系及彼此的消长,来说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特征。施拉姆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二元之间的矛